

DOI:10.3969/j.issn.1674-8131.2022.05.007

董事网络作用下的企业精准扶贫同群效应研究

谢帮生,尹婷,汪金祥*,刘党文

(福建农林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摘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需要将企业的精准扶贫经验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新动能。企业精准扶贫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同群行为具有乘数效应,然而现有文献对企业精准扶贫同群效应的研究局限于地区和行业层面,有待拓展和深化。

由同一人在不同企业兼任董事形成的董事网络是我国资本市场的普遍现象,其具有很强的信息传递功能,能够拓宽信息获取渠道、提高信息获取质量,并通过企业间的学习机制产生同群效应,进而导致同群企业的行为具有趋同性。以2016—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经验分析发现:(1)总体上看,董事网络的形成会促进企业的精准扶贫行为,表现为存在董事网络的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概率和扶贫资金投入均明显高于不存在董事网络的企业;(2)董事网络作用下的企业精准扶贫同群效应显著存在,表现为目标企业的精准扶贫行为(参与精准扶贫的概率和扶贫资金的投入)会因同群企业精准扶贫行为的增加而增进,且这种同群效应在不同类型董事网络中、对于不同扶贫方式均显著存在;(3)董事网络主要通过信息传递机制和企业学习机制产生精准扶贫同群效应,表现为目标企业结构洞位置和董事会开会次数的增加会强化同群效应;(4)企业精准扶贫效果也存在一定的同群效应,表现为目标企业帮助脱贫人数与同群企业帮助脱贫人数显著正相关;(5)企业精准扶贫同群效应会对企业发展产生积极的经济后果,表现为同群效应带来的精准扶贫行为增进有利于企业价值提升和政府补助增加。此外,除基于董事网络的同群企业外,同地区、同行业的同群企业也存在显著的精准扶贫行为趋同现象。

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探讨董事网络作用下的企业精准扶贫同群效应及其形成机制,并进行实证检验,拓展和深化了董事网络的经济效应研究以及企业精准扶贫的经验分析,有助于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本文研究表明,企业精准扶贫的同群效应广泛存在,并产生了积极的乘数效应。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程中,一方面,政府应鼓励企业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并进行合理的方向指引;另一方面企业要加强信息沟通和相互学习,充分利用多维度的同群效应积极投身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实现企业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共赢。

关键词:董事网络;精准扶贫;同群效应;同群企业;同群行为;结构洞;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F273.7;F3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22)05-0099-18

* 收稿日期:2022-06-14;修回日期:2022-08-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9BGL087)

作者简介:谢帮生(1977),男,福建霞浦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资本市场会计问题研究。尹婷(1998),女,江西吉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资本市场会计问题研究。汪金祥(1983),通信作者,男,福建永泰人;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公司财务与资本市场研究;E-mail:wkc128@foxmail.com。刘党文(1996),男,四川攀枝花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资本市场会计问题研究。

一、引言

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回顾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贫困治理始终摆在发展战略和国家治理的突出重要位置。1986年从中央到地方成立扶贫领导小组(王亚华等,2021)^[1],2015年“打响脱贫攻坚战”更是将扶贫事业推向新高潮,2020年11月23日实现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然而,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并非意味着减贫事业的终止。《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指出,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要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这表明,党和政府将致力于建立健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长效机制,并积极探索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有效路径,推动实现共同富裕。脱贫攻坚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宝贵经验,因此,深入研究总结我国贫困治理,尤其是精准扶贫的成效和经验,对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相对贫困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在精准扶贫的热潮中,企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据笔者的统计,2016—2020年上市公司在精准扶贫上的投入额累计达3490亿元。大量研究对企业的精准扶贫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精准扶贫行为受公司业绩、公司规模、高管政治关联、地方财政压力、巡视监督等众多因素的影响(杜世风等,2019;施赟等,2020;聂军等,2020;简冠群等,2022)^[2-5]。企业行为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特征和地区环境,还会受到其他企业,尤其是具有相同特征或一定联系的企业行为的影响。具有某种共同特征(如属于同一行业、处于同一地区等)或具有某种经济社会联系(如有共同的董事、同受特定政策的影响等)的企业通常被称为同群企业,同群企业基于其特定的关联形成特定的同群网络,在同群网络的作用下,同群企业不但会实施某些共同行为(即同群行为),而且会产生相互影响的同群效应,即网络中企业的行为决策会受到其他同群企业行为的影响。部分研究从群体行为的视角出发研究了企业精准扶贫的同群效应,发现上市公司的精准扶贫行为会受到同行业或同地区其他上市公司的影响(文雯等,2021;俞毛毛等,2022)^[6-7]。然而,企业精准扶贫的同群效应,并不仅仅表现在同行业、同地区的同群企业网络中,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企业精准扶贫的其他同群效应,比如在董事网络作用下的同群效应。

董事网络是因同一董事在不同企业的兼任行为而形成的一种同群网络。若A企业的董事同时担任B企业的董事,则A、B两企业属于同一董事网络;当研究对象为A企业时,A企业被称为目标企业,B企业则是A企业的董事网络同群企业。在我国资本市场中,董事网络是一种普遍现象,上市公司中72.13%的企业拥有董事网络(卢昌崇等,2009)^[8]。资源基础理论认为,对于处在竞争环境中的企业而言,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向先进企业学习能够提高决策效率和竞争优势。资本市场竞争激烈,并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企业想要获得竞争优势,需加强和其他企业的沟通交流,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和行为,进而提高自身决策的准确性和科学性。由董事兼任行为形成的董事网络能够在企业的沟通交流中发挥信息桥梁的作用,而且通过董事网络获取的信息通常比其他渠道获得的信息更准确可靠,同时董事作为企业的决策主体,掌握着企业的战略规划和发展动向,因此董事网络的存在会通过企业间的信息传递和相互学习影响企业的行为选择,并产生显著的同群效应。

相关的经验研究发现,嵌入同一董事网络中的企业,在并购、避税、捐赠等企业行为上存在趋同现象(Haunschild et al,1993;Brown et al,2013;陈仕华等,2011;王莹等,2017)^[9-12],佐证了在董事网络作用下会产生企业行为的同群效应。同时,部分文献探讨了在同行业和同地区的同群企业网络作用下的精准扶贫同群效应(文雯等,2021;俞毛毛等,2022)^[6-7],然而,还缺乏关于董事网络作用下的企业精准扶

贫同群效应研究。事实上,董事网络具有天然的信息传递功能,能够在同群企业的同群效应形成中发挥独特作用。因此,本文基于董事网络层面探讨企业的精准扶贫同群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相比已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一是从理论上论证了企业精准扶贫存在董事网络作用下的同群效应,并探讨了形成该同群效应的信息传递机制和企业学习机制;二是以2016—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董事网络作用下企业精准扶贫同群效应的存在性及其信息传递和学习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企业精准扶贫效果的同群效应以及同群效应的经济后果。本文拓展和深化了董事网络的经济效应研究以及企业精准扶贫的经验分析,研究结论能够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政策参考和推进思路。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基于董事网络的企业精准扶贫同群效应

精准扶贫是我国脱贫攻坚过程中的一项国家战略和重要政策,在政策引领的大环境下,不管是出于积极回馈社会或提升社会声誉的动机,还是为了通过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增进与政府的联结,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精准扶贫纳入决策范围。与早期的扶贫政策相比,精准扶贫更强调持续性的“造血式”扶贫,而非简单的“输血式”扶贫,因而与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相比,精准扶贫更注重参与行为的成效和持续性,企业精准扶贫行为对企业资源配置和长远发展的影响也更大。因此,企业的精准扶贫行为决策需要更加谨慎,并需要对扶贫对象、扶贫方式、扶贫力度等进行科学抉择和长远规划。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具有各种有形或无形的资源,这些资源可转变成企业独特的能力,成为企业持久竞争优势的源泉,处于竞争环境中的企业应通过充分利用企业内部资源、向先进企业学习等方式提高决策效率,实现企业的持续高质量发展。面对影响因素众多、决策难度较大的精准扶贫行为决策,企业管理层需要广开言路,多与其他企业进行沟通交流,学习其他企业的先进做法,提高决策效率和实施效果。而董事网络为企业决策提供了一种低成本且高质量的信息交流和学习渠道,董事会可以利用其董事在其他企业兼任董事的便利,通过寻找参照物并借鉴和学习其行为的方式提高决策效率、降低投资风险(周军等,2018;周雪峰等,2021)^[13-14]。董事网络是企业的重要资源之一,董事网络中的同群企业是目标企业决策的理想参照物(陈仕华等,2013)^[15],董事网络能够通过其特有的信息传递功能对目标企业的精准扶贫决策和行为产生影响。

具体来讲,一方面,董事网络能够拓宽企业决策的信息获取渠道。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一现象不仅表现在不同企业当中,也存在于企业的股东与经理人之间(Jensen et al, 1976)^[16]。由董事在其他企业的兼任行为形成的董事网络,能够在网络内的企业之间构建一种“关系”网络,促进企业间的相互交流与学习,并促使同群企业的决策和行为对目标企业的精准扶贫决策和行为产生影响。另一方面,董事网络能够提高目标企业决策的信息获取质量。企业获取信息的渠道多种多样,包括媒体、审计师、分析师等,然而市场中的信息并非全部都是有用和有效的,质量越高的信息对企业决策的影响越大。由于董事能够参与到企业的决策和管理过程中,并掌握着企业的战略规划和发展动向,对于相关信息的了解更及时、掌握更准确,因而在众多的信息渠道中,董事网络更具影响力,且能够为目标企业提供更可靠、有效的同群企业的信息(Haunschild et al, 1993; Shropshire, 2010)^{[9][17]}。若董事网络中的同群企业做出精准扶贫决策、实施精准扶贫行为,这一信息会通过董事网络及时准确地传导至目标企业,进而促进目标企业精准扶贫决策的形成和行为的实施,最终表现为董事网络作用下企业精准扶贫行为的趋同,即同群效应。除此之外,社会规范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决策会受到周围群体的影响(Cialdini et al, 2004)^[18],因而董事网络同群企业是否履行精准扶贫的社会责任,会影响目标企业的精

准扶贫行为偏好和决策,从而促成企业精准扶贫的同群效应。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1:在董事网络的作用下,企业精准扶贫存在同群效应,表现为同群企业的精准扶贫参与概率和扶贫投入增加对目标企业的精准扶贫参与概率和扶贫投入具有正向影响。

2. 董事网络产生同群效应的信息传递和企业学习机制

作为一种关系网络,董事网络能够拓宽企业获取外部信息的渠道,增加企业向其他企业学习的机会,进而促成目标企业与同群企业在精准扶贫行为上的趋同。在这种基于董事网络的同群效应的形成过程中,有效信息在企业间的传递和企业间的相互学习起到关键作用。

一方面,董事网络能够提高企业获取外部信息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但是不同的企业在基于董事网络形成的同群企业网络中占据不同的位置,能够获得的信息多少以及信息的质量也是不同的,因而董事网络会对具有信息获取优势的目标企业产生更强的同群效应。描述个体网络位置的指标有多种,包括程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和结构洞等,不同指标反映的网络位置特征存在差异。其中,结构洞是指某些个体之间存在无直接联系或关系间断的现象,从网络整体看,好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一般来讲,在网络中占据结构洞位置的个体具有信息获取优势,个体占据的结构洞位置越多,则其信息获取优势越明显(Burt,1997)^[19]。相关经验分析也发现,结构洞能够帮助企业更快、更高效地获取信息,进而产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并购绩效等效应(Reagans et al,2001;姚艳虹等,2022;尹筑嘉等,2018;江涛等,2019)^[20-23]。当董事网络同群企业作出了精准扶贫决策和行为时,具有结构洞位置优势的目标企业能够较快地获取更多的相关信息,及时高效地借鉴学习同群企业的做法,进而更快地做出相应决策并付诸实践。

另一方面,仅仅拥有信息获取优势还不够,还需要目标企业进行有效的学习。精准扶贫与其他社会责任及传统的扶贫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是一个“新生事物”,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而董事网络能够给企业提供特有的学习机制。董事作为企业的决策主体,能够参与企业的战略决策和经营管理。当一名董事所在企业进行精准扶贫决策、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时,若其兼任董事的其他企业已经做出了相关决策及实施方案,该名董事就可以向董事会提出来自其他公司的相关做法及效果,这些信息被董事会重视并纳入企业决策中,就形成了企业基于董事网络的“学习机制”(廖方楠等,2021)^[24]。在这种学习机制中,董事会会议发挥了关键作用。董事会会议是董事间沟通交流的重要方式,董事会召开次数是董事会勤勉程度的直观反映,也体现了企业决策时董事间进行信息交流和相互学习的意愿(Masulis et al,2014;Chou et al,2013)^[25-26];同时,董事会开会次数越多,董事网络的信息传递功能越能得到更好的发挥,企业通过董事网络的学习强度也越高(Castro et al,2009;Forbes et al,1999)^[27-28]。当然,除了董事会会议这一正式的制度外,董事会成员之间的沟通还包括诸如邮件、电话、董事会会议前后的闲谈等非正式方式,这些非正式方式同样能够发挥信息传递的作用(Garg,2013;谢永珍等,2015)^[29-30]。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2:目标企业的信息获取优势和积极学习对董事网络作用下的精准扶贫同群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表现为目标企业在董事网络中结构洞位置的提高、董事会开会次数的增加能够增强精准扶贫同群效应。

三、实证分析设计

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为验证董事网络作用下的企业精准扶贫同群效应,参考王营和曹延求(2017)、文雯等(2021)的研究

方法^{[6][12]},本文构建模型(1)和模型(2)来检验研究假说 H1,模型(1)为 Probit 模型,模型(2)为 OLS 回归模型。

$$P(PPA_1)_{i,t} = \alpha_0 + \alpha_1 NETPPA_1_{i,t} + \alpha \sum Controls_{i,t} + Year_i + Industry_t + \varepsilon_{ii} \quad (1)$$

$$PPA_2_{i,t} = \alpha_0 + \alpha_1 NETPPA_2_{i,t} + \alpha \sum Controls_{i,t} + Year_i + Industry_t + \varepsilon_{ii} \quad (2)$$

其中, i 和 t 分别代表样本目标企业和年度。模型(1)的被解释变量($PPA_1_{i,t}$)为“目标企业精准扶贫参与”,是目标企业 i 是否参与精准扶贫的虚拟变量,若目标企业在 t 年度实施了精准扶贫行为则赋值为1,否则为0;解释变量($NETPPA_1_{i,t}$)为“同群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比例”,采用 t 年度目标企业 i 的董事网络同群企业(不包括企业 i)中参与精准扶贫的企业比例来衡量(王营等,2017;冯戈坚等2021)^{[12][31]}。模型(2)的被解释变量($PPA_2_{i,t}$)为“目标企业精准扶贫投入”,采用 t 年度目标企业 i 精准扶贫投入金额的自然对数来衡量;解释变量($NETPPA_2_{i,t}$)为“同群企业平均精准扶贫投入”,采用 t 年度目标企业 i 的董事网络同群企业(不包括企业 i)精准扶贫投入金额均值的自然对数来衡量(王营等,2017;冯戈坚等,2021)^{[12][31]}。为了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借鉴韩洁等(2015)、王营和曹延求(2017)的研究^{[12][32]},模型(1)和模型(2)均从公司特征、董事会特征及股权特征三方面选取如下控制变量(测度方法见表1):公司特征层面控制“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盈利能力”3个变量,董事会特征层面控制“董事会独立性”和“二职合一”2个变量,股权特征层面控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管理层持股比例”“产权性质”3个变量。此外,在模型中控制年度($Year$)和行业($Industry$)固定效应,以消除时间变化和行业差异产生的影响, ε 为随机误差项。

同时,构建调节效应模型(3)和模型(4)来检验研究假说 H2:

$$P(PPA_1)_{i,t} = \alpha_0 + \alpha_1 NETPPA_1_{i,t} + \alpha_2 M_{i,t} + \alpha_3 M \times NETPPA_1_{i,t} + \alpha \sum Controls_{i,t} + Year_i + Industry_t + \varepsilon_{ii} \quad (3)$$

$$PPA_2_{i,t} = \alpha_0 + \alpha_1 NETPPA_2_{i,t} + \alpha_2 M_{i,t} + \alpha_3 M \times NETPPA_2_{i,t} + \alpha \sum Controls_{i,t} + Year_i + Industry_t + \varepsilon_{ii} \quad (4)$$

其中, M 代表调节变量。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选取两个调节变量:一是目标企业在董事网络中的“结构洞位置”,借鉴陈运森(2015)、刘善仕等(2017)和张勇(2021)的方法^[33-35],基于董事间直接和间接关系的约束程度计算各董事在董事网络中占据的结构洞数量(具体计算方法参见相关文献),再通过计算均值得到企业层面的结构洞位置数据,用以反映目标企业通过董事网络获相关信息的优势程度,其值越大则信息获取优势越明显。二是目标企业的“董事会开会次数”,采用目标企业董事会当年的开会次数来衡量,用以反映目标企业向同群企业学习的程度。

表1 主要变量的测度方法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测度方法
被解释变量	目标企业精准扶贫参与	若目标企业实施了精准扶贫行为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目标企业精准扶贫投入	$\ln(1 + \text{目标企业精准扶贫投入金额})$, 金额单位为万元
解释变量	同群企业精准扶贫参与比例	董事网络同群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比重
	同群企业平均精准扶贫投入	$\ln(1 + \text{董事网络同群企业精准扶贫投入金额的平均值})$
调节变量	结构洞位置	目标企业在董事网络中结构洞位置的均值
	董事会开会次数	目标企业董事会年度开会次数

续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测度方法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目标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目标企业年末总负债/年末总资产
	盈利能力	目标企业净利润/总资产平均余额
	董事会独立性	目标企业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总人数
	二职合一	目标企业董事长与总经理为同一人时赋值为 1, 否则赋值为 0
	产权性质	目标企业产权性质为国有则赋值为 1, 否则赋值为 0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目标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总股数
	管理层持股比例	目标企业管理层持股数/总股数

2. 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本文以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期间为 2016—2020 年^①,并对样本进行如下删选:一是剔除样本期间内被 ST、*ST 及 PT 的样本;二是剔除金融行业的样本;三是剔除数据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四是仅保留在研究期间内拥有董事网络的样本;五是对所有连续变量在 1% 和 99% 分位上进行 winsorize 处理以避免极端值的影响。其中,精准扶贫相关信息、董事会成员兼任情况以及公司财务数据来自 CSMAR 数据库(China Stock Market & Accounting Research Database),董事网络结构数据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hinese Research Data Services Platform, CNRDS),董事网络同群企业的构建以董事会成员兼任情况为基础进行手工处理和分类汇总。最终本文得到的研究样本为 3 329 家公司、11 397 个年度观测值、36 446 组董事网络关系对。样本分布情况如表 2、图 1 和图 2 所示。从年度变化来看,目标企业占当年上市公司总数的比例均在 65% 以上,且在样本期间呈逐年上升趋势;样本的年度分布较为均匀且拥有董事网络的目标企业数量和董事网络关系对数逐年递增;从兼任董事的类型来看,由外部董事兼任行为形成董事网络的目标企业及董事网络关系对远多于内部董事,其中 7 775 个目标企业的连锁董事均为外部董事,3 070 个目标企业的连锁董事包括外部董事和内部董事,仅 552 个目标企业的连锁董事均为内部董事。表 3 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表 2 各年度的目标企业样本量及占比

年度	样本量	总样本量占比/%	上市公司总数	占上市公司总数比例/%
2016	1 840	16.14	2 791	65.93
2017	2 190	19.22	3 159	69.33
2018	2 244	19.69	3 216	69.78
2019	2 421	21.24	3 331	72.68
2020	2 702	23.71	3 649	74.05
合计	11 397	100.00	16 146	70.56

注:上市公司总数为剔除 ST、*ST、PT、金融行业及缺失值样本后的上市公司总数。

^① 由于 2016 年才开始强制要求上市公司披露有关精准扶贫的信息并对披露格式进行规范,因此选择以 2016 年为研究的开始年度;本研究开始时能够获取的最新数据为 2020 年的数据,故样本终止年度为 202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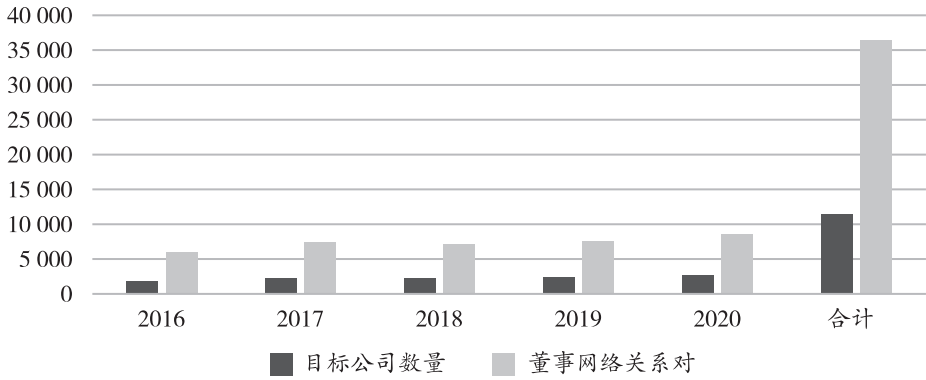


图1 样本目标企业和董事网络关系对的年度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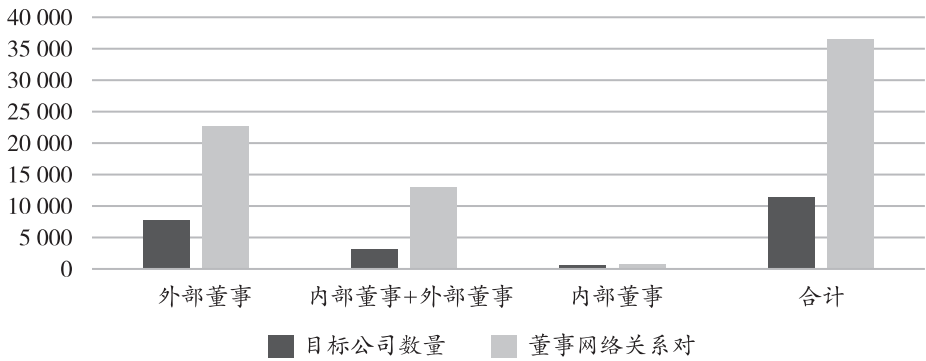


图2 外部和内部董事兼任的样本目标企业与董事网络关系对分布

表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P25	中位数	P75	
被解释变量	目标企业精准扶贫参与	11 397	0.251	0.434	0.000	1.000	0.000	0.000	1.000
	目标企业精准扶贫投入	11 397	1.153	2.223	0.000	8.993	0.000	0.000	0.470
解释变量	同群企业精准扶贫参与比例	11 397	0.271	0.315	0.000	1.000	0.000	0.200	0.500
	同群企业平均精准扶贫投入	11 397	2.296	2.566	0.000	9.613	0.000	1.546	4.238
调节变量	结构洞位置	11 397	0.715	0.081	0.441	0.860	0.667	0.725	0.775
	董事会开会次数	11 397	9.932	3.992	4.000	25.000	7.000	9.000	12.000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11 397	22.269	1.297	20.073	26.277	21.320	22.081	22.992
	资产负债率	11 397	0.405	0.195	0.060	0.861	0.249	0.395	0.547
	盈利能力	11 397	0.047	0.066	-0.250	0.228	0.018	0.044	0.080
	董事会独立性	11 397	0.377	0.052	0.333	0.571	0.333	0.364	0.429
	二职合一	11 397	0.326	0.469	0.000	1.000	0.000	0.000	1.000
	产权性质	11 397	0.268	0.443	0.000	1.000	0.000	0.000	1.000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11 397	0.335	0.144	0.084	0.730	0.223	0.312	0.427
	管理层持股比例	11 397	0.165	0.206	0.000	0.694	0.000	0.045	0.312

四、实证分析结果

1. 董事网络作用下的精准扶贫同群效应检验

表4是以变量“同群企业精准扶贫参与比例”和“同群企业平均精准扶贫投入”的均值进行分组后的差异性检验,“目标企业精准扶贫参与”和“目标企业精准扶贫投入”的均值差异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董事网络同群企业与目标企业在精准扶贫参与概率和扶贫投入上具有正相关性,研究假说H1初步得到验证。

表5为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同群企业精准扶贫参与比例”和“同群企业平均精准扶贫投入”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董事网络同群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概率的提高会促使目标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概率增加,同群企业精准扶贫投入的增加也会促使目标企业加大精准扶贫投入,即在董事网络作用下企业的精准扶贫行为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研究假说H1得到验证。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杜世风等(2019)、文雯等(2021)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2][6]},总体上看,规模较大、资产收益率较高的企业以及国有企业的精准扶贫参与度和资金投入力度较高。

表4 样本分组差异性检验

Panel A:按同群企业平均精准扶贫投入的均值分组						
变 量	小于均值组		大于均值组		均值差异检验	t 值
	样本量	均值	样本量	均值		
目标企业精准扶贫参与	6 262	0.202	5 135	0.311	-0.109***	-13.496
目标企业精准扶贫投入	6 262	0.877	5 135	1.490	-0.613***	-14.793
Panel B:按同群企业精准扶贫参与比例的均值分组						
变 量	小于均值组		大于均值组		均值差异检验	t 值
	样本量	均值	样本量	均值		
目标企业精准扶贫参与	6 669	0.202	4 728	0.320	-0.119***	-14.534
目标企业精准扶贫投入	6 669	0.885	4 728	1.531	-0.646***	-15.445

表5 企业精准扶贫同群效应检验结果

变 量	模型(1)		模型(2)	
	目标企业精准扶贫参与	目标企业精准扶贫参与	目标企业精准扶贫投入	目标企业精准扶贫投入
同群企业精准扶贫参与比例	0.441*** (10.84)	0.251*** (5.81)		
同群企业平均精准扶贫投入			0.116*** (13.11)	0.062*** (7.71)
企业规模		0.238*** (16.84)		0.623*** (25.93)
资产负债率		-0.035 (-0.37)		-0.325*** (-2.72)
盈利能力		2.187*** (8.63)		2.354*** (8.71)
董事会独立性		0.116 (0.44)		0.931** (2.50)
二职合一		-0.010 (-0.31)		-0.004 (-0.10)

续表

变 量	模型(1)		模型(2)	
	目标企业精准扶贫参与	目标企业精准扶贫参与	目标企业精准扶贫投入	目标企业精准扶贫投入
产权性质		0.467*** (13.02)		0.500*** (8.64)
第一大股东持股 比例		0.026 (0.26)		0.276* (1.89)
管理层持股比例		-0.403*** (-4.73)		-0.158* (-1.67)
常数项	-0.637*** (-4.76)	-6.212*** (-18.11)	1.399*** (4.76)	-12.999*** (-21.59)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1 397	11 397	11 397	11 397
R ²	0.058	0.141		
Adj. R ²			0.083	0.217

注:***、**、*分别表示 $p < 0.01$ 、 $p < 0.05$ 、 $p < 0.1$,括号内数值为 t 值,为了减小结论的误差,在回归时均使用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2.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本文核心结论(假说 H1)的稳健性,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

(1)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董事网络带来的同群效应可能要在一段时间以后才能够显现,因此对被解释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重新进行模型回归。估计结果见表 6 的 Panel A,与基准模型回归结果一样,“同群企业精准扶贫参与比例”和“同群企业平均精准扶贫投入”的估计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 6 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和替换解释变量回归结果

Panel A: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Panel B:替换解释变量		
变 量	目标企业精准 扶贫参与 _{t+1}	目标企业精准 扶贫投入 _{t+1}	变 量	目标企业精准 扶贫参与	目标企业精准 扶贫投入
同群企业精准 扶贫参与比例	0.271*** (5.18)		同群企业是否 参与精准扶贫	0.150*** (5.30)	
同群企业平均 精准扶贫投入		0.057*** (6.05)	同群企业精准 扶贫投入总额		0.052*** (7.9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7 657	7 657	样本量	11 397	11 397
R ²	0.137		P. R ²	0.141	
Adj. R ²		0.200	Adj. R ²		0.217

(2)替换解释变量。构建虚拟变量“同群企业是否参与精准扶贫”,若董事网络同群企业中有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采用“ $\ln(1 + \text{董事网络同群企业精准扶贫投入总额})$ ”计算得到“同群企业精准扶贫投入总额”变量;并用“同群企业是否参与精准扶贫”和“同群企业精准扶贫投入总额”

分别替换“同群企业精准扶贫参与比例”和“同群企业平均精准扶贫投入”,重新进行模型回归。估计结果见表6的Panel B,“同群企业是否参与精准扶贫”和“同群企业精准扶贫投入总额”的估计系数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3)控制地区和行业同群效应。董事在不同企业的兼任行为可能存在自选择性,比如其可能会选择在同行业或者同地区的企业中兼任董事,导致董事网络同群企业可能属于同一行业或处于同一地区,进而可能同时还存在地区和行业的同群效应。对此,本文借鉴冯戈坚和王建琼(2021)的方法^[31],在模型(1)和模型(2)中分别引入变量“同省份同行业其他企业精准扶贫参与比例”和“同省份同行业其他企业平均精准扶贫投入”,以控制企业位于同一地区和属于同一行业产生的同群效应,其中,行业统计口径按照《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制造业使用二级分类。模型回归结果见表7,“同省份同行业其他企业精准扶贫参与比例”和“同省份同行业其他企业平均精准扶贫投入”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精准扶贫存在显著的地区和行业同群效应;同时,“同群企业精准扶贫参与比例”和“同群企业平均精准扶贫投入”的估计系数也显著为正,表明在控制了地区和行业同群效应后,董事网络作用下的企业精准扶贫同群效应依然显著。

表7 控制地区和行业同群效应回归结果

变 量	目标企业精准扶贫参与	目标企业精准扶贫投入
同群企业精准扶贫参与比例	0.095**(2.11)	
同群企业平均精准扶贫投入		0.056*** (7.02)
同省份同行业其他企业精准扶贫参与比例	2.431*** (29.52)	
同省份同行业其他企业平均精准扶贫投入		0.171*** (15.6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1 397	11 397
P. R ²	0.218	
Adj. R ²		0.236

(4)区分董事网络类型。在资本市场中,董事分为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企业的日常经营与管理主要由内部董事负责。在职责划分上,与外部董事相比,内部董事的业务范围更广、职权更大,在决策上享有更大的话语权,因此,不同类型董事兼任行为形成的董事网络带来的同群效应可能有所不同。本文将目标企业样本划分为“连锁董事均为外部董事”“连锁董事包括外部董事和内部董事”“连锁董事均为内部董事”3个子样本,分别进行模型回归。估计结果见表8,3个子样本中,“同群企业精准扶贫参与比例”和“同群企业平均精准扶贫投入”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进一步表明本文的核心结论是稳健的。

(5)区分扶贫方式。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方式有多种,大体上可划分为产业扶贫和非产业扶贫两种方式。产业扶贫方式主要是通过促进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来提高贫困人口的经济收入,非产业扶贫方式更多的是通过改善贫困区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以及基础设施等来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和质量。鉴于两类扶贫方式存在显著区别,本文参考(杜世风等,2019;邓博夫等,2020)的方法^{[21][36]},将企业的精准扶贫行为区分为产业扶贫和非产业扶贫两种类型分别进行检验^①,以明确董事网络作用下的精

① CSMAR 数据库中包括产业发展脱贫、转移就业脱贫、易地搬迁脱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生态保护扶贫、兜底保障、社会扶贫和其他项目9种扶贫方式,本文将除产业发展脱贫外的其他方式均归为非产业扶贫方式。

准扶贫同群效应是否在不同类型的扶贫行为中均存在。运用模型(2)从扶贫投入层面进行分析:以“目标企业产业扶贫投入”和“目标企业非产业扶贫投入”为被解释变量,分别采用“ $\ln(1+\text{目标企业产业扶贫投入金额})$ ”和“ $\ln(1+\text{目标企业非产业扶贫投入金额})$ ”来衡量;以“同群企业平均产业扶贫投入”和“同群企业平均非产业扶贫投入”为解释变量,分别用“ $\ln(1+\text{董事网络同群企业产业扶贫投入金额的均值})$ ”和“ $\ln(1+\text{董事网络同群企业非产业扶贫投入金额的均值})$ ”来衡量。估计结果见表9,“同群企业平均产业扶贫投入”和“同群企业平均非产业扶贫投入”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无论是产业扶贫还是非产业扶贫,均存在董事网络作用下的企业精准扶贫同群效应。

表8 区分董事类型的分组回归结果

变 量	连锁董事均为外部董事		连锁董事包括外部董事和内部董事		连锁董事均为内部董事	
	目标企业精准 扶贫参与	目标企业精准 扶贫投入	目标企业精准 扶贫参与	目标企业精准 扶贫投入	目标企业精准 扶贫参与	目标企业精准 扶贫投入
同群企业精准 扶贫参与比例	0.206*** (3.98)		0.387*** (3.94)		0.346** (2.29)	
同群企业平均 精准扶贫投入		0.046*** (4.86)		0.072*** (4.28)		0.159*** (3.5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7 775	7 775	3 070	3 070	552	552
P. R ²	0.131		0.167		0.166	
Adj. R ²		0.197		0.258		0.190

表9 区分扶贫方式的回归结果

变 量	目标企业产业扶贫投入	目标企业非产业扶贫投入
同群企业平均产业扶贫投入	0.040***(5.17)	
同群企业平均非产业扶贫投入		0.053***(6.6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1 397	11 397
Adj. R ²	0.173	0.150

3. 结构洞位置和董事会开会次数的调节效应检验

表10为模型(3)和模型(4)的回归结果,其中Panel A为结构洞位置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Panel B为董事会开会次数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所有交乘项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目标企业在董事网络中信息获取优势的增强和学习强度的增加都会显著强化董事网络作用下的精准扶贫同群效应,即信息传递机制和企业学习机制在精准扶贫同群效应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假说H2得到验证。

表 10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Panel A:结构洞位置的调节效应			PanelB:董事会开会次数的调节效应		
变 量	目标企业精准 扶贫参与	目标企业精准 扶贫投入	变 量	目标企业精准 扶贫参与	目标企业精准 扶贫投入
同群企业精准 扶贫参与比例	-0.957*** (-2.61)		同群企业精准 扶贫参与比例	0.068 (0.60)	
同群企业平均 精准扶贫投入		-0.172** (-2.39)	同群企业平均 精准扶贫投入		-0.022 (-0.97)
结构洞位置	-0.543** (-2.25)	-0.874*** (-2.90)	董事会开会次数	-0.006 (-1.15)	-0.014** (-2.04)
结构洞位置×同群企业 精准扶贫参与比例	1.701*** (3.32)		董事会开会次数×同群 企业精准扶贫参与比例	0.018* (1.76)	
结构洞位置×同群企业 平均精准扶贫投入		0.326*** (3.23)	董事会开会次数×同群 企业平均精准扶贫投入		0.008*** (3.7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1 397	11 397	样本量	11 397	11 397
P. R ²	0.142		P. R ²	0.141	
Adj. R ²		0.218	Adj. R ²		0.219

4. 进一步的研究

(1)董事网络对企业精准扶贫的促进作用

上文基于存在董事网络的样本企业数据采用验证了董事网络作用下的企业精准扶贫同群效应,但不能说明存在董事网络的企业比不存在董事网络的企业有更高的精准扶贫同参与概率和扶贫投入。为进一步检验董事网络的形成是否能够促进企业的精准扶贫行为,本文将不存在董事网络的企业样本也纳入模型,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对样本进行匹配(匹配变量为前文的控制变量),进而以虚拟变量“董事网络”(当样本企业存在董事网络时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为解释变量进行模型分析,结果见表11。“董事网络”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存在董事网络的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概率和扶贫投入均显著高于不存在董事网络的企业,即董事网络的形成具有促进企业精准扶贫行为的积极效应。

(2)企业精准扶贫效果的同群效应

上文基于企业的精准扶贫行为(参与和投资)分析了董事网络作用下的同群效应,那么在扶贫效果上是否也存在同群效应?值得进一步分析。为了检验企业精准扶贫效果是否也存在同群效应,借鉴文雯等(2021)的研究^[6],本文从企业帮助脱贫的人数和企业扶贫获奖情况两个方面进行实证检验:以“目标企业帮助脱贫人数”和“目标企业扶贫获奖”为被解释变量,分别采用“ $\ln(1+\text{目标企业帮助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人数})$ ”和“ $\ln(1+\text{目标企业扶贫获奖情况})$ ”来衡量;以“同群企业平均帮助脱贫人数”和“同群企业平均扶贫获奖”为解释变量,分别采用“ $\ln(1+\text{董事网络同群企业帮助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人数的均值})$ ”和“ $\ln(1+\text{董事网络同群企业扶贫获奖情况的均值})$ ”来衡量。数据来自数据为CSMAR精准扶贫数据库,其中扶贫获奖情况根据授予单位级别进行赋值,具体为区县级及其他奖励赋值为1,市级奖励赋值为2,

省级及社会团体奖励赋值为 3,国家级奖励赋值为 4,若一家企业同一年度内有多项扶贫获奖则进行加总计算。分析结果见表 12,“同群企业平均帮助脱贫人数”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但“同群企业平均扶贫获奖”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表明在帮助脱贫人数上董事网络作用下的同群效应显著存在,而在扶贫获奖上董事网络作用下的同群效应不显著。其原因可能在于,企业帮助脱贫的人数取决于其精准扶贫的方式以及扶贫投入的多少,是企业精准扶贫行为的直接实际结果,而企业扶贫获奖还会受到社会影响、媒体宣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表 11 倾向得分匹配的回归结果

变量	企业精准扶贫参与			企业精准扶贫投入		
	(1)	(2)	(3)	(4)	(5)	(6)
董事网络	0.291*** (4.44)	0.209*** (4.48)	0.204*** (5.31)			
董事网络				0.042*** (3.36)	0.050*** (5.61)	0.052*** (7.0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7 149	12 062	16 125	7 149	12 062	16 125
P. R ²	0.188	0.191	0.204			
Adj. R ²				0.133	0.134	0.135

注:(1)(4)列的匹配方法为 1:1 最近邻匹配,(2)(5)列的匹配方法为 1:3 最近邻匹配,(3)(6)列的匹配方法为卡尺半径匹配(卡尺取 0.01)。

表 12 扶贫效果的同群效应检验结果

	目标企业帮助脱贫人数	目标企业扶贫获奖
同群企业平均帮助脱贫人数	0.039*** (4.23)	
同群企业平均扶贫获奖		0.011 (1.0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1 397	11 397
Adj. R ²	0.163	0.058

(3)同群效应的经济效果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既是履行其社会责任,也会给企业发展带来一定好处,比如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社会声誉提高及其带来的企业价值提升等。既然董事网络能够通过信息传递和企业学习机制产生企业精准扶贫的同群效应,那么由此带来的精准扶贫行为增进能否对目标企业自身发展产生良好的经济效果?对此,本文构建模型(5),从资源获取和价值提升两方面进一步检验这种同群效应的经济效果。

$$Gov_{i,t}/TobinQ_{i,t} = \alpha_0 + \alpha_1 PEERPPA_1_{i,t}/PEERPPA_2_{i,t} + \alpha \sum Controls_{i,t} + Year_i + Industry_i + \varepsilon_{it} \quad (5)$$

其中:被解释变量(Gov 和 $TobinQ$)为“政府补助”和“企业价值”,“政府补助”采用“(政府补助总额/

营业收入) $\times 100$ ”来衡量,“企业价值”采用 TobinQ 值度量,具体计算方法为“(流通股市值+非流通股股份数 \times 每股净资产+负债账面值)/总资产”;被解释变量($PEERPPA_1$ 和 $PEERPPA_2$)为“扶贫参与的同群效应”和“扶贫投入的同群效应”,参考王莹和曹延求(2017)的方法^[12],分别采用模型(1)的“ $\alpha_1 NETPPA_1$ ”(基于表5第2列结果)和模型(2)的“ $\alpha_1 NETPPA_2$ ”(基于表5第4列结果)来计算,剥离出目标企业精准扶贫行为中受董事网络同群企业影响的部分,以反映由同群效应带来的目标企业精准扶贫行为增进。分析结果见表13,“扶贫参与的同群效应”和“扶贫投入的同群效应”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可见,董事网络作用下的同群效应不仅增进了目标企业的精准扶贫行为,而且有利于其政府补助和企业价值的增加。

表13 同群效应的经济后果的回归结果

变 量	(1)	(2)	(3)	(4)	(5)	(6)	(7)	(8)
	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 _{t+1}	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 _{t+1}	企业价值	企业价值 _{t+1}	企业价值	企业价值 _{t+1}
扶贫参与的 同群效应	0.703*** (3.72)	0.683*** (2.96)			0.528*** (4.08)	0.439*** (3.12)		
扶贫投入的 同群效应			0.344*** (3.70)	0.293*** (2.62)			0.288*** (4.41)	0.236*** (3.48)
企业规模	-0.075*** (-4.75)	-0.060*** (-3.16)	-0.077*** (-4.86)	-0.062*** (-3.24)	-0.290*** (-24.82)	-0.284*** (-21.43)	-0.292*** (-24.90)	-0.286*** (-21.60)
资产负债率	-0.884*** (-8.13)	-0.842*** (-6.33)	-0.882*** (-8.11)	-0.841*** (-6.32)	-0.257*** (-3.43)	-0.328*** (-3.73)	-0.255*** (-3.41)	-0.328*** (-3.72)
盈利能力	-1.250*** (-4.23)	-1.336*** (-3.85)	-1.260*** (-4.27)	-1.339*** (-3.85)	3.050*** (13.61)	2.777*** (12.10)	3.042*** (13.57)	2.774*** (12.09)
董事会独立性	0.887*** (3.00)	1.236*** (3.37)	0.885*** (2.99)	1.227*** (3.34)	0.883*** (4.53)	0.942*** (4.27)	0.881*** (4.52)	0.936*** (4.24)
二职合一	0.077** (2.32)	0.068* (1.68)	0.075** (2.25)	0.067 (1.64)	0.033 (1.49)	0.049** (1.96)	0.032 (1.41)	0.048* (1.92)
产权性质	0.013 (0.35)	0.064 (1.35)	0.019 (0.48)	0.070 (1.48)	-0.085*** (-3.27)	-0.076*** (-2.61)	-0.081*** (-3.17)	-0.074** (-2.55)
第一大股东 持股比例	-0.256** (-2.44)	-0.409*** (-3.23)	-0.256** (-2.45)	-0.405*** (-3.20)	-0.187*** (-2.75)	-0.191** (-2.48)	-0.187*** (-2.75)	-0.188** (-2.45)
管理层 持股比例	0.250*** (2.94)	0.310*** (2.91)	0.255*** (2.99)	0.312*** (2.93)	-0.879*** (-14.63)	-0.920*** (-13.81)	-0.874*** (-14.57)	-0.916*** (-13.75)
常数项	3.316*** (7.96)	2.398*** (4.87)	3.369*** (8.05)	2.453*** (4.97)	8.819*** (31.32)	8.248*** (27.07)	8.867*** (31.37)	8.292*** (27.23)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1 397	7 657	11 397	7 657	11 397	7 657	11 397	7 657
Adj. R ²	0.089	0.098	0.089	0.098	0.238	0.269	0.238	0.269

五、结论与启示

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本文主要探讨了董事网络作用下的企业精准扶贫同群效应,采用2016—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显示:第一,存在董事网络的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概率和扶贫投入均显著高于不存在董事网络的企业,表明董事网络的形成对企业精准扶贫行为具有促进作用;第二,董事网络同群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概率的和扶贫投入的提高会促使目标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概率和扶贫投入增加,表明在董事网络作用下企业的精准扶贫行为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且这种同群效应在连锁董事为外部董事和内部董事的董事网络中、在企业产业扶贫和非产业扶贫中均显著存在,在控制了地区和行业同群效应后也显著存在;第三,目标企业结构洞位置和董事会开会次数的增加会强化同群企业对目标企业的精准扶贫的正向影响,表明董事网络主要通过信息传递机制和企业学习机制产生企业精准扶贫同群效应;第四,目标企业帮助脱贫人数与同群企业帮助脱贫人数具有显著正相关性,表明在企业精准扶贫效果上也存在董事网络作用下的同群效应;第五,同群效应带来的目标企业精准扶贫行为增进与目标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和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表明董事网络作用下的同群效应不仅可以增进目标企业的精准扶贫行为,而且能够为目标企业带来价值提升和资源获取等积极的经济后果。

在同群效应的影响下,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具有积极的乘数效应。一方面,一家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减贫事业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其自身行为的结果,而且会产生辐射作用,带动同群企业共同参与精准扶贫,由点发展成面,形成帮扶集群,从而显著增强扶贫力量、扩大扶贫范围、提升扶贫绩效;另一方面,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及其同群效应也会给企业自身发展带来积极的经济后果,有效提升其企业价值和资源获取能力,进而实现企业发展与贫困治理的双赢。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从解决“两不愁三保障”转向接续推进乡村振兴,而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同样离不开企业的参与。因此,需要将企业精准扶贫的经验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新动能。基于企业精准扶贫的同群效应,可得到以下启示:第一,政府应鼓励企业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激励更多的企业投身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当然,乡村振兴涉及农村、农业、农民发展的方方面面,并非所有领域都适合所有企业参与,因此,政府还应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方向和方式进行科学引导。第二,企业应积极拓展信息渠道,尤其要充分利用多维度同群企业网络的信息传递功能增强信息获取优势,并强化企业间的有效学习机制,在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效率的同时,持续提升同群效应的功效及其积极的经济后果,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共同推进。

本文探究了董事网络作用下的企业精准扶贫效应,并分析了这种同群效应产生的内在机理,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和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比如:当前尚未对企业参与对乡村振兴的信息披露进行要求,不同企业对相关信息的披露在格式上和内容上存在差异,不具备可比性,因而本文未能进一步针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进行定量分析;在机制检验部分,本文通过董事会开会次数来反映企业的学习机制,但这一指标仅仅是对会议数量的度量,并未深入到会议内容层面,不能反映学习的质量;等等。因此,在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程中,进一步的研究需要关注上市公司年报中有关乡村振兴的信息披露以及相关政策文件,不断拓展和深化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行为及其效果的理论探讨和经验分析。

参考文献:

- [1] 王亚华,舒全峰.中国精准扶贫的政策过程与实践经验[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6(1):141-155+205.
- [2] 杜世凤,石恒贵,张依群.中国上市公司精准扶贫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社会责任的视角[J].财政研究,

2019(2):104-115.

- [3] 施贇,舒伟. 制度推动、政治关联与非国有企业参与精准扶贫[J]. 统计与决策,2020,36(20):163-167.
- [4] 聂军,冉戎,唐源琬. 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与企业精准扶贫投入[J]. 商业研究,2020(3):104-112.
- [5] 简冠群,李鑫. 巡视监督促进了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吗?——盈余管理的中介效应与党组织嵌入的调节作用[J]. 西部论坛,2022,32(1):50-65.
- [6] 文雯,朱沛青,宋建波. 近朱者赤:上市公司精准扶贫行为的同群效应[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1,23(4):63-75+106.
- [7] 俞毛毛,钱金城. 企业精准扶贫决策分析——基于同群效应的视角[J]. 金融发展研究,2022(1):58-66.
- [8] 卢昌崇,陈仕华. 断裂联结重构:连锁董事及其组织功能[J]. 管理世界,2009(5):152-165.
- [9] HAUNSCHILD P R, BECKMAN C M. Inter-organizational imitation: The impact of interlocks on corporate acquisition activity[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3,38:564-592.
- [10] BROWN J L, DRAKE K D. Network ties among low-tax firms [J]. The Accounting Review,2013,89(2):483-510.
- [11] 陈仕华,马超. 企业间高管联结与慈善行为一致性——基于汶川地震后中国上市公司捐款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2011(12):87-95.
- [12] 王莹,曹廷求. 董事网络下企业同群捐赠行为研究[J]. 财经研究,2017,43(8):69-81.
- [13] 周军,刘晓彤,杨茗. 董事网络影响股价崩盘风险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3(1):61-74.
- [14] 周雪峰,李珍珠,王红建. 董事网络位置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风险承担的遮掩和中介效应[J]. 研究与发展管理,2021,33(2):53-66.
- [15] 陈仕华,卢昌崇. 企业间高管联结与并购溢价决策:基于组织间模仿理论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2013(5):144-156.
- [16] JENSEN M C, MECKLING W H.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3(4):305-360.
- [17] SHROPSHIRE C. The role of the interlocking director and board receptivity in the diffusion of practices[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10,35(2):246-264.
- [18] CIALDINI R B, GOLDSTEIN N J. Social influence: Compliance and conformity[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2004,55(1):591-621.
- [19] BURT R S. The contingent value of social capital[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7,42(2):339-365.
- [20] REGANS R, ZUCKERMAN E W. Networks, diversity, and productivity: The social capital of corporate R&D teams[J]. Organization Science,2001,12(4):502-517.
- [21] 姚艳虹,龚榆. 双层网络嵌入下结构洞对企业二元创新的影响[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22,39(1):99-109.
- [22] 尹筑嘉,曾浩,毛晨旭. 董事网络缓解融资约束的机制:信息效应与治理效应[J]. 财贸经济,2018,39(11):112-127.
- [23] 江涛,陈富永,汤思禹. 基于“关系型”社会情境的董事网络对并购绩效影响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19(11):183-192.
- [24] 廖方楠,韩洪灵,陈丽蓉. 独立董事连锁对内部控制的影响机理:基于声誉效应与学习效应的实证研究[J]. 管理工程学报,2021,35(2):101-112.
- [25] MASULIS R W, MOBBS S. Independent director incentives: Where do talented directors spend their limited time and energy?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4,111(2):406-429.
- [26] CHOU H I, CHUNG H, YIN X. Attendance of board meetings and company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Taiwan[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2013,37(11):4157-4171.
- [27] CASTRO C B, DE LA CONCHA M D, GRAVEL J V, et al. Does the team leverage the board's decisions? [J].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2009,17(6):744-761.
- [28] FORBES D P, MILLIKEN F J. Cogni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Understanding boards of directors as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group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9,24(3):489-505.

- [29] GARG. Ventureboards; Distinctive monitoring and implications for firm performan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3, 38(1):90-108.
- [30] 谢永珍,张雅萌,张慧,等. 董事会正式、非正式结构对董事会会议频率的影响——非正式沟通对董事会行为强度的调节作用[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5, 37(4):15-28.
- [31] 冯戈坚,王建琼. 社会网络视角下的现金股利分配行为及其同群效应[J]. *管理评论*, 2021, 33(3):255-268.
- [32] 韩洁,田高良,李留闯. 连锁董事与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基于组织间模仿视角[J]. *管理科学*, 2015, 28(1):18-31.
- [33] 陈运森. 社会网络与企业效率:基于结构洞位置的证据[J]. *会计研究*, 2015(1):48-55+97.
- [34] 刘善仕,孙博,葛淳棉,等. 人力资本社会网络与企业创新——基于在线简历数据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2017(7):88-98+119+188.
- [35] 张勇. 独立董事关系网络位置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基于程度中心度和结构洞视角[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21(2):40-52.
- [36] 邓博夫,陶存杰,吉利.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与缓解融资约束[J]. *财经研究*, 2020, 46(12):138-151.

Research on the Peer Effec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by Enterprises under the Role of Board Network

XIE Bang-sheng, YIN Ting, WANG Jin-xiang, LIU Dang-we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Fujian, China)

Abstract: To effectively link the consolidation and expans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ments with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turn the experience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of enterprises into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peer behavior widely existing in the practice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by enterprises has a multiplier effect. However,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the peer effec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by enterprises is limited to the regional and industrial levels, which needs to be expanded and deepened.

The board network formed by the same person serving as directors in different enterprises is a common phenomenon in China's capital market. It has a strong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function, which can broaden the information access channel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generate the peer effect through the learning mechanism among enterprises, which in turn leads to the convergence of the behavior of peer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Shanghai-Shenzhen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6 to 2020, it is found that: (1) on the whole, the formation of a board network can promote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which shows that the probability of participating i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e investmen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s of enterprises with board network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without board network; (2) the peer effec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by enterprises under the role of board network is significant,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behavior (the probability of participating i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e investmen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s) of target enterprises will be enhanced by the increase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behavior of the same group of enterprises. This peer effect is significant in different types of board networks and for different poverty alleviation methods; (3) the board network produces the peer effec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mainly through the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mechanism and enterprise learning mechanism, which shows that the increase of the target enterprise's structural hole positions and the number of board meetings will strengthen the

peer effect; (4) the effec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by enterprises also has a certain peer effect, which shows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number of people helped out of poverty by target enterprises and the number of people helped out of poverty by peer enterprises; (5) the peer effec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will have goo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behavior brought by the peer effect is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enterprise value and the increase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Besides, in addition to the peer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board network, there is also a significant convergence phenomenon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behaviors among peer enterprises in the same region and industry.

Based o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eer effec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ts formation mechanism under the role of board networks, and conducts an empirical test. It has expanded and deepened the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board network and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by enterprises, which is helpful to the consolidation and expans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ments and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with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peer effec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by enterprises is widespread and has a positive multiplier effect. In the process of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effectively connecting with rural revitalization, on the one h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encourage enterprise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rovide reasonable guidance; on the other hand, enterprises should strengthe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mutual learning, make full use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peer effect,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practice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so as to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between enterprise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Key words: board network;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eer effect; peer enterprises; peer behavior; structural holes; rural revitalization

CLC number: F273.7; F320.3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4-8131(2022)05-0099-18

(编辑:黄依洁)

声 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同时,本刊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万方——数字化期刊群》《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科技论文在线》《超星数字图书馆》《国研网》《龙源期刊网》《教育阅读网》《博看网》等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其中《国研网》为选择性收录),论文在本刊发表后将通过上述数据库传播。

文章凡经本刊选用,即视为作者同意本刊代理该作品电子版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并且本刊有权授权其他机构进行该作品电子版信息的网络传播。

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本刊上述声明。若作者不同意其作品收录入上述或其他数据库,请在来稿时说明,我们可做相应处理。

西部论坛编辑部